

孔子与孔府文学

石 玲

摘要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孔子也是孔氏家族文化的奠基者和缔造者,一代又一代孔氏圣裔以崇敬、守成的态度传承着孔子的思想和精神,文学创作就是一个重要载体。在对以孔子为起点的孔氏家族文学活动进行考察后发现,孔子后裔在思维方式、生存态度、价值取向以及审美追求等方面都带有孔子思想的鲜明烙印。孔氏圣裔的文学创作自觉将个体情感诉求纳入到社会纲常伦理框架之中,并呈现出中和优雅的风貌。

关键词 孔子 孔氏圣裔 孔府文学

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17)06-0139-09

作者:石玲,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
济南 250014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孔子也是孔氏家族文化的奠基者和缔造者,他所建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他的后裔而言就是家学。两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孔子后裔以崇敬、守成的态度,传承着孔子的思想和精神。

没有孔子也就谈不上孔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曲阜孔氏圣人家族以“府”相称是从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开始的,这一年,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首次受封“衍圣公”,自此有了“衍圣公府”,有了“府”的称谓。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是广义“孔府”概念,用“孔府”指代由孔子开启的孔氏家族,而所谓孔府文学,就是指孔子以来孔氏家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孔子是孔府家族精神的奠基人,也是孔府文学的光辉起点,他与孔府文学是源与流的关系。

—

孔子不仅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且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学思想,并对其后世子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孔子时代的文学概念与我们今天的文学概念是不同的。《论语·先进》篇中曾出现“文学”二字,“文学:子游、子夏。”皇侃《论语义疏》转引范宁之语曰:“文学,谓善先王典文。”^①可见当时所谓“文学”,是指通晓典籍文献,涵盖了当今历史、政治、文学、哲

^①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44页。

学、音乐等多学科的内容。

文学思想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孔子的政治思想一样带有鲜明的伦理色彩,追求“个体的感性心理欲求与社会的理性道德规范统一”^①。

就思想成就而言,孔子是一个集大成者,其思想的形成与周朝、与鲁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农耕经济、礼乐文化以及宗法观念是孕育孔子思想的社会土壤。

孔子故乡曲阜是周朝分封诸侯国鲁国的都城。鲁国境内分布着大片良田,间以丘陵高地,有泗、沂两条河流横贯全境,自然条件很适宜人类生存和生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考古发掘已探明,至迟在北辛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时期,先民们就已经在此从事农业生产和渔猎活动了。由于农业生产循环往复的规律性,使得生产、生活的经验显得尤为重要,久而久之人们也就形成了对经验的依赖和崇拜,而对经验的崇拜也就导致了对祖先、对先人的崇拜,再加上稳定的村落聚居,就逐渐形成一种保有、守成的生存态度,事事要遵从古法。这种经验崇拜很明显地体现在孔子的言行中,他一心向往西周的礼制,一生念念不忘“克己复礼”。

鲁文化超常的稳定性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印证,历经千年不变的是“祖训”,因此,鲁地文化忠实地传承了儒家思想观念。可以说,由保守而导致的稳定性是鲁地文化最鲜明的特征,也是孔府家族精神最鲜明的特征。

如果说地理环境对居民的思维和行为发生了强有力的影响,那么,如同查尔斯·R.佩奇和卡尔·A.沃尔兹所指出的那样“任何土地和民族的历史,都受到他们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这不仅包括诸如气候、土壤、地貌等自然的特性,而且也包括与相邻地区的地理政治学的关系。”^②也就是说,地理环境还应包括与相邻地区的地理政治学的关系。鲁国的建立与礼乐文化的推行有密切关系。当年伯禽代父赴鲁就封之初,就推行周代礼乐文化,为“周礼尽在鲁”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伯禽“变其俗,革其礼”开始,一直到春秋时期鲁国“犹秉周礼”,鲁国始终唯周是尊、唯礼是尊。

孔子的文学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对诗的评价上。《论语》中涉及诗的地方前后多达二十几处。孔子时代诗的概念要远远大于今天诗的文体概念,功能相当广泛。孔子有言“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显然,在孔子心目中,“诗”是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诗学观念中的“兴、观、群、怨”说尤其值得注意。“兴、观、群、怨”语出《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四个字由内到外、由己及他,从不同角度对诗歌的形成、特点和功能进行了高度概括,充分体现了孔子诗学强调个体心理欲求与社会道德伦理相统一、理性精神与诗性思维相统一的特色。

“兴”,借用宋代朱熹的解释就是“感发志意”,是指对主观情感的触动生发,也就是激发、活跃人的情志,是诗歌抒情特质的体现。

“观”,是俯视或置身局外的观察。《礼记·经解》谓“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

①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

② [美]查尔斯·R.佩奇、卡尔·A.沃尔兹《圣地与圣经》,张兢、刘素云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就读者而言,“观”还有一个观察、认知的功能,认识社会、认识他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群”用汉代孔安国的解释就是“群居相切磋”,朱熹则将“群”注为“和而不流”,关注到了“群”的另一面,即在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过程中又不苛求自己与别人完全一致,从而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与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意义相近。从更深的层面上看,“群”是心理、伦理及情感的多维聚合,它与“礼”在某些方面有所交集。“礼”是以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去规范社会各个阶层的关系,注重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定位;而“群”在协调个人意志与社会秩序、个人欲望与道德规范中起到重要作用,更偏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砥砺与相处。

“怨”,它偏重情绪的宣泄。孔安国认为“怨”用来“刺上政”,其实,但凡情志受到压制,通过诗去“怨”是允许的,但不能过激,要“怨而不怒”。与此相联系的,是孔子另一个特别重要的诗学理念,那就是“过犹不及”的中庸尺度。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过犹不及”即“中庸”的尺度和审美取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中庸”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孔子看来,“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叩其两端”(《论语·子罕》)执其中,寻求一个恰到好处的度,即一种和谐平衡的状态。

孔子借助《诗经》来表达自己的审美追求和审美标准。他称赞《诗经·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将“乐”与“哀”掌握在恰当的尺度。在《论语》中,孔子反复表达了这种不能走向极端、有张有约的观点,譬如“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喜怒哀乐是人之本能的情感状态,一旦表达出来,就要求恰如其分,约之以“礼”,有所克制,温柔敦厚,不过度、不激烈。

“中和”的美学标准是儒家“中庸”思想在诗歌批评中的具体体现。《中庸》载“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在“中庸”的心理机制下生成的文学理念,无疑对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发生了巨大影响。

孔子认为,不仅感情的抒发要合乎中和要求,而且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也要讲求“文质彬彬”:“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只把内容随意杂陈,便会粗糙而村野,没有文采,无审美性可言;如果只有华丽的修饰而无充实的内容,则又流于虚浮、夸饰。“质”和“文”同样要和谐、要适度。仔细品味,在“文”与“质”的关系中,孔子似更看重后者,反对“巧言令色”(《论语·学而》),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论语·里仁》)。

总之,在孔子诗学思想中,个体感情意志的抒发要自觉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尺度内,要平和,要敦厚;内容与形式也要统一在“文质彬彬”的平衡状态。孔子的这些观念对其后裔发生了极大影响。

二

孔子与孔府文学是源与流的关系。孔子本人奉行“述而不作”,其后裔继承了这种文化守成态度,千百年来主要是阐释经学。孔子后裔中,以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的思想成就为最高。现存“四书”之一的《中庸》相传为他所著。此外,孔子十一代孙、汉代的孔安国是传授和研究《古文尚书》的经学家,孔子十三代孙、汉代的孔衍著有十四卷《春秋公羊传集解》;孔子七代

孙、清代孔广森著有《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大戴礼记补注》等等。

孔子曾经说过“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其后裔谨遵先圣教诲,在典籍文章方面甚为勤勉,有大量著作问世,可惜已大量亡佚。据现存文献,在孔子之后至唐朝,孔子后裔尚有著作存目或存世的有:孔安国(孔子十一代孙)的《孔安国集》;孔衍(孔子十三代孙)的《孔衍集》;孔光(孔子十三代孙)的《孔光集》;孔丰(孔子十八代孙)的《孔丰集》;孔季彦(孔子二十代孙)的《孔季彦集》;孔融(孔子二十代孙)的《孔北海集》;孔觐(孔子三十一代孙)的《孔觐集》,等等。其中文学成就最大的当属东汉时期的孔融。

孔融是孔子后裔中有成就、有个性、有影响的文学家。据《后汉书》记载,孔融有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共二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孔融集》九卷,目前的通行本有明代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孔少府集》。

孔融是一个多色彩的圣裔。他恃才负气,有时乖戾疏狂,但终归是一个有才气、有个性的圣裔文学家。他成名很早,其事迹中的礼让、忠君、孝义等等,都不离儒家忠孝节义的内容。踏上仕途后,时代的乱离、圣裔的身份、天资聪颖而又秉性刚直、略显张狂的个性,构成了命运的多重奏鸣,而汉末以名行相高的士林风气亦助长了他的疏狂之气,“盖其时轻生尚气已成习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已成卓特之行,而不知其非也”^①。

最能体现孔融创作个性的文体是散文,包括论议、策文、表、檄、教令、书记、书信等,其中最为擅长的是奏议类散文,代表作品有《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等。孔融文章最突出的特点是气势宏大,纵横捭阖,有铺张扬厉、呼啸奔腾之势。如《荐祢衡表》中描写祢衡的才气,用“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的文字出之,灵动灵异、气势充沛。苏轼对他评价奇高“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②孔融的慷慨任气也正体现了建安文学的特色。

孔融诗作仅有7首传世,其中以两首《杂诗》成就较高。第一首托物咏怀,既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抒发,也有“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的慨叹,以及对自己“不慎小节”孤傲个性的自赏,对世俗的轻蔑,表达的内容丰富复杂。

孔融在文学史上名气很大,除了其文学成就外,一是因为“让梨”、救助张俭“争死”等举动所博得的声名,在一个文学尚未完全进入自觉、独立的时代,这些礼让、仁义之举对臧否人物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二是魏文帝曹丕对他的评价甚高,将其列为“建安七子”之首“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琰、东平刘楨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馭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称赞孔融文章“扬(扬雄)、班(班固)俦也”^③,对孔融文坛地位的建立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两宋时期,孔氏圣裔文集大多亡佚,有文学作品传世的主要有北宋的孔道辅和“清江三

① 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4页。

② 苏轼《乐全先生文集叙》,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4页。

③ 曹丕《典论·论文》,见夏传才、唐绍忠《曹丕集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页。

孔”等。

孔道辅是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宋史》有传。他曾上奏真宗皇帝扩建孔庙,还修建了第一座孟子庙。《全宋诗》收其《访隐居孙明复山斋》二首、《题祖庙》二首诗作。其《题祖庙》云:“门有诗书不华彩,素王留得好生涯。行人莫讶频回首,天下文章第一家。”从“天下文章第一家”的诗句可以读出圣裔的自豪感。

江西的“清江三孔”,即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孔子第四十七代孙,主要活动于北宋熙宁至绍圣年间。《临江西江孔氏族谱》记载“清江三孔”的先祖孔绩为孔子四十世孙,唐末出任吉州推官,遭逢黄巢起义,任满后不复北归,择西江而居,遂成为西江孔氏第一世。

“清江三孔”有着自觉的圣裔意识,如孔武仲在《安堂记》《萧贯之挂冠亭记》《思养亭记》《筠州无讼堂记》等文章中,屡以“鲁国孔武仲”、“鲁国孔某”自称;孔平仲则以“吾祖”来称呼孔子。作为圣裔,他们自觉传承孔子所缔造的家族精神,“居家孝悌,行己谨信,莅官敬,事上忠,其行美矣”^①。他们与当时文坛名流曾巩、苏轼兄弟以及苏门诸君子多有交往。三兄弟中,武仲和平仲存诗较多,在诗歌创作上推重杜甫。

“清江三孔”的文学创作既发扬了孔氏家学精神,也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为孔氏家族文学在宋代的发展,写下了较为辉煌的一页。

此外,孔子五十一代孔元措著有《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孔元措(1181—1251)字梦得,由金入元,《金史》有传。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袭封衍圣公。《孔氏祖庭广记》是现存孔氏家族较早的一部家谱和曲阜“祖庭”文献,记载了孔氏祖庭事迹、林庙族世、古今名号、典礼沿革等内容,是研究孔氏家族的重要史料。

从整个孔府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元明时期应是孔府文学创作比较低落的时期。据《阙里志》《阙里文献考》《孔氏南宗考略·元代名贤事迹考》等文献资料记载,元代孔子后裔的著述大致如下:

孔子五十代孙孔拱著有《锡山草堂集》五卷、《村居杂兴》三卷,惜乎未见传本。孔拱字执谦,少孤,好学,年五十三卒。孔子五十二代孙孔洙著有《承斋集》二卷,亦未见传本。孔洙(1128—1287)字思鲁,宋淳祐元年(1214)袭封衍圣公,宋亡不仕。元至元十九年(1282),朝廷议立孔子后,以寓衢者为大宗。孔洙奉诏赴京,朝廷意欲命其载封归曲阜奉祀。孔洙以先世坟墓在衢,不忍离舍,遂让封号给曲阜宗弟孔治,受到元世祖称赞。孔子五十二世孙孔万龄著有《渔唱集》,未见传本。孔万龄字松年,衍圣公孔文远次子,恩授将仕郎、袁州分宜县尹。元军攻克江西后,元世祖仍授其原职,孔万龄辞疾不赴,归隐衢州。孔子五十三代孙孔涛著有《存存斋稿》,未见传本。《孔子世家谱》谓,孔涛字世平,泰定元年会试第十九名进士。孔子十五代孙孔克齐著有《自然亭诗》。钱大昕《元史艺文志》载有“孔肃夫(孔克齐字肃夫)《自然亭诗》”^②,未见传本。孔子五十三世孙孔津著有《鲁林集》一卷,未见传本。孔津字世鲁,曾参订南北宗图,赠奉训大夫、兖州知州,年四十五卒。元代孔子后裔的著述大都未见传本,其文学成就也就无从谈起。

^① 周必大《三孔先生集序》,见孙永选校点《清江三孔集》,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页。

^② 钱大昕《元史艺文志》,见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二十二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6页。

“衍圣公”地位在明代达到顶峰,从《阙里志》《阙里文献考》《曲阜志》《山东通志》等各种文献的存目来看,明代孔氏圣裔著述丰富,大致如下:

孔子五十五代嫡长孙孔克坚著有《遗稿》。孔克坚(1316—1370)字璟夫,通《左传》,工乐府。元至元元年(1335)袭封衍圣公,迁礼部尚书,累官国子监祭酒。孔子五十五代孙孔克晏著有《巢愚稿》一卷,未见。《阙里文献考》卷七十六《子孙·著闻者第十五之四》谓其“博通经史,不轻著作,每为文必经营数日而后成”。《山左明诗抄》收其《雨后望峰山》一诗。孔子五十六代孙孔希恭著有《韦庵诗稿》一卷、《云窗赞古诗集》,未见。孔希恭字士安,号韦庵,孔尚任《孔子世家谱》称其“博学工诗”。孔子五十八代孙孔公恂著有《詹事集》二十卷,未见。孔公恂字宗文,景泰五年进士,历官南京詹事,孔尚任《孔子世家谱》称其“文辞宏整,诗追盛唐”。孔子五十八代孙孔公璜著有《北窗迂叟稿》一卷,未见。孔公璜字文,号北窗迂叟,《阙里志》收其《陪李相公拜祖庙》《祭尼山》等诗作。孔子六十代孙孔承庆著有《礼庭吟稿》三卷,今存。孔承庆(1424—1454)字永祚,衍圣公孔彦缙之子,未及袭封而卒。孔子六十一代孙孔宏颐著有《北游咏》一卷、《西山雅咏》一卷,未见。孔宏颐号内莹,又号凌华,由恩贡任保定府高阳县知县。孔子第六十三代孙孔贞时著有《在鲁斋文集》五卷,今存。孔贞时(1571—1620)字中甫,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检讨,历起居注官。孔子六十三代孙孔贞运著有《敬事草》五卷,今存。孔贞运(1574—1644)字开仲,号玉横。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纂修两朝实录。官至首辅,崇祯十七年闻崇祯帝哀诏,恸绝遽卒。谥文忠。《明史》有传。《阙里文献考》谓其还著有《行余草》,未见。

明代孔氏圣裔作品存世的却很少,主要有孔承庆的《礼庭吟》、孔贞运的《敬事草》、孔贞时的《在鲁斋文集》等,而这些存世作品的文学成就并不高。

清代是孔氏圣裔文学创作极为活跃的时期,孔府文学呈现繁荣的局面。

从康熙到嘉庆年间前后百多年中,先后出现了孔尚任、孔传鈇、孔广林、孔昭虔等多位孔氏圣裔戏曲作家,这与孔府家蓄戏班有着密切关系。作品主要有孔尚任的《小忽雷》《桃花扇》;孔传鈇的《软羊脂》《软邮筒》《软锯锯》;孔广林的《斗鸡杆》《璇玑锦》《女专诸》《松年长生引》;孔昭虔的《荡妇秋思》《葬花》等。创作形式上有传奇,也有杂剧。在这些圣裔剧作家笔下,戏曲承载着厚重的内容,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相当强烈。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然非孔尚任《桃花扇》莫属。

《桃花扇》取材于南明旧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明末四公子”之一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悲欢为线索,用史家眼光对南明小朝廷乃至整个明朝的覆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①。

从创作成就和影响来看,孔尚任无疑是孔府文学发展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与《长生殿》作者洪昇比肩,有“南洪北孔”之誉。

清代孔氏圣裔有大量诗文集保存下来。今传世者计有孔尚任(孔子六十四代孙)的《石门山集》《湖海集》《岸堂稿》《长留集》;孔传铎(孔子六十八代孙)的《申椒集》《盟欧草》《绘心集》《安远堂文集》;孔传鈇(孔子六十八代孙)的《补闲集》;孔丽贞(孔子六十八代女孙)的《籍

^① 孔尚任《桃花扇小识》,见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7页。

兰阁草》;孔继澐(孔子六十九代孙)的《纯斋遗草》;孔继荣(孔子六十九代孙)的《心向往斋集》《江上集》;孔广森(孔子七十代孙)的《仪郑堂文》;孔广珪(孔子七十代孙)的《漱石山房诗集》;孔昭虔(孔子七十一代孙)的《镜虹吟室诗集》《镜虹书屋吟草》;孔昭恢(孔子七十一代孙)的《春及园虫鸣草》;孔宪培(孔子七十二代孙)的《凝绪堂诗稿》;孔庆镛(孔子七十三代孙)的《铁山园诗集》《春华集》《忠恕堂集》;孔璐华(孔子七十三代女孙)的《唐宋旧经楼稿》;孔祥淑(孔子七十五代女孙)的《韵香阁诗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孔氏圣裔诗人群体中出现了多位女诗人,有曲阜的孔丽贞、孔璐华、孔淑成、孔祥淑、孔印兰,浙江桐乡的孔传莲、孔广芬、孔继坤、孔继瑛、孔素瑛、孔昭蕙,此外还有孔府的媳妇颜小来、叶粲英、孙苔玉、于珊兰(于氏)等等。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寡居素淡(孔丽贞为代表)、琴瑟和谐(以孔璐华为代表)、女中豪杰(以孔祥淑为代表)等类型,分别代表了她们不同的生存状态。

美国学者在论及中国古代妇女生存状况时指出“妻子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她丈夫的地位,还取决于她娘家的声望,更有甚者,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还取决于她的孩子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①这是切合中国封建时代的国情的。老祖宗孔子赋予这些女诗人不同寻常的血统或家族荣耀,但她们仍不能摆脱封建时代妇女的从属地位。

三

当代关于孔府的研究主要是由历史学家来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向奎主持编选了《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花费大量心血搜集整理了曲阜孔府档案史料,为相关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孔府研究著作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何龄修等撰写的《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齐武著《孔氏地主庄园》,以及美国 Christopher S. Agnew 的博士论文《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Making of the Descents of Confucius, 1300—1800》(《1300—1800 间孔子后裔文化与权力的形成》)等。但对于孔府研究而言,除了剖析其形成、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家族精神的继承、发展与演变,孔府文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孔氏圣裔最常用的文体是诗、文和戏曲。纵观整个孔府文学的发展,孔氏圣裔的文学活动受孔子影响很大。学诗学礼是圣裔们呱呱坠地后的必修功课。虽然在经学家那里,对《诗经》的经学属性更加看重,但作为抒情言志的载体,《诗经》毕竟还是诗,有其鲜活生动的一面。在孔氏圣裔那里,对《诗经》的接受有时呈现出文学与经学互相纠合的特点。

孔子对其后裔的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生存态度以及价值取向、审美追求等方面。当然,这种影响也不仅仅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

第一,崇古、尚古的思维取向是孔子及其后裔最为鲜明的思维特征。孔子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对古代典籍怀有极大的敬意,一再声称自己“好古,敏以求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建立在农耕文明经验崇拜基础上的保守思维模式与思维取向,一直贯穿在孔氏圣裔的精

^① Walter H. Slote and George A. Devos, Preface, Confucianism and the family, edited by Walter H. Slote and George A. Devo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98.

神活动之中,形成守正、守成的特色。

这种崇古、尚古的思维取向表现在孔氏家族的文学创作上,就是唯圣祖孔子推崇的经典和典范马首是瞻。他们往往自觉追步先人,亦步亦趋,带有很强的复古倾向,模拟之作较多。譬如,孔子第六十八代嫡长孙孔传铎、第七十二代嫡长孙孔宪培都有模仿《古诗十九首》的诗歌作品;第七十三代孙孔庆镕模拟歌行体,还曾模仿王士禛《秋柳四章》作《秋柳八首》,这样的做法自然很难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更有甚者,孔子七十代孙孔广林以治经的态度从事戏曲创作,特别追求严谨,这无疑影响了戏曲作品的文学性,因而受到了学者的批评“孔广林以研究经学的严谨态度作曲,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每折戏自己亲笔作注释,详引曲谱,比较前人文句,使合于曲律,功力之深,为其他曲家所不及。这是他的长处,但也正因为如此,以致使其词意很难做到流利畅达。”^①

崇古、尚古的思维取向一方面延续了古老的文化之脉,但同时也往往使得孔氏圣裔作家不能在精神世界里驰骋想象,甚至不能开怀畅吟,不能嬉笑怒骂,而显得拘谨、刻板,缺少生命的张力和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他们的创造精神,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成就。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汉代的孔融恃才不羁,铺张扬厉,激扬文字,尽情挥洒自己的才华。但这样的圣裔作家毕竟少之又少。

第二,立足现实世界,关注现实社会、现实生活,在社会框架中完成个人价值的实现。基于对经验的崇拜,鲁文化里较少虚幻的、鬼神的内容,孔子本人就“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更重视和关注现实社会与纲常人伦,与齐文化富有想象、空间转换跳跃的特色迥然不同。前者孕育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后者则催生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与莫言的系列作品——地域文化的影响一直延伸到今天。

孔子的学说立足于社会管理,特别强调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修养,主张在伦理规范的框架内实现个人价值。换言之,孔子面向现实社会、现实生活,非常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社会责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在这两个方面,孔子后人的领会与践行都堪称典范。

孔子后裔的文学创作都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社稷苍生具有一份神圣的责任感、使命感,他们积极用世,追求建功立业。从创作内容来看,他们写现实、现世的事儿,思考并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积极的用世之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孔子后裔鲜明的文化基因。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孔子后裔的历史意识很强,在他们的文学活动中,也鲜明体现着史家观念和正统意识。如“建安七子”之一孔融的文学创作,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色;孔尚任的《桃花扇》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剧中的李香君是一个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精神结构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建立在社会责任意识基础之上的是非观念,在明清之际的国家民族利益面前深明大义,她的政治见识甚至超过复社文人侯方域,这使她中国在戏剧史上大放异彩。

孔子后裔作家在表现方式上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认为美存在于现实的人间,堵塞了一切从超现实、超人类的神秘世界去寻找美的道路”^②,平实而不虚妄。纵观孔氏圣裔的文学创作,他们的目光大都聚焦现实社会生活,几乎没有什么怪诞不经的描写。个别作家虽然有

① 周妙中《清代戏曲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

②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158页。

所涉及,也是为明确的创作主旨服务的。譬如,孔传铤的传奇中出现了狐仙、仙人下凡,《软邮筒》中杜朗生救起一仙狐而得其救助,《软银鍬》中仙人下凡化为侠客韦双成,但作者借此表现的则是国家利益、忠奸斗争及君臣、朋友间的伦理道义等等,而且这种超现实的描写在孔氏圣裔作者那里仅为个案,并不多见。

第三,道德人家的圣人色彩。孔氏圣裔作家的创作带有鲜明的圣人色彩。圣人人格注重品行的崇高和完美,因而具有一种牺牲的神圣和悲壮。在孔子后裔的文学活动中,道德一直是他们坚守、表现和颂扬的内容,这成为孔府文学一个突出而鲜明的特征。对社会道德和个人操守的执着坚守,显然打上了孔子思想的印记。

对孔子后裔而言,圣人家族给了他们显赫,同时也带给他们约束,他们往往谨言慎行、中规中矩,自觉追求圣人人格。换言之,作为传承圣人思想理念的精神贵族,孔子后裔以保守和克制来完成道德上的完善。

孔子后裔“承大圣人之家学,源远流长,温柔敦厚,其得力于诗教者深矣”^①。他们模范地践行“发乎情,止乎礼”的规范,在作品中宣扬仁、义、礼、智、信。他们以孔子倡导的伦理道德指导并约束自己的人生和言行,以乃祖创立的价值观评判历史、臧否人物。如孔尚任《桃花扇》中的忠奸观念;孔尚任传奇《小忽雷》中的郑盈盈“心如铁石贞”,“生死不相负”,重然诺、守节操;孔广林杂剧《女专诸》中的女子左仪贞深明大义,机智地诛杀逆贼,为国除害;……这样的例子在孔子后裔的文学创作中比比皆是。

在孔子后裔的文学创作中,就连女性诗人也体现了“道德文章”的特色,譬如孔子七十五代女孙孔祥淑,她不仅是“才女”,更是“贤妇”,其诗作中有《训子》《训女》《训子姪》一类的篇什,“训子女于严正”。

第四,中和优雅的精神风貌。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从诗歌形式的发生来看,土地(尤其是平原)之“方”、气候之“温”,在很大程度上孕育了整饬的句式和 不偏不倚、有所克制的表达习惯。

孔子的中庸思想、温柔敦厚诗歌理念对后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庸”、“温柔敦厚”成了孔子后裔的自觉追求。孔传铤就曾表白,他作词不言悲哉、不作恨人,始终保持平淡、平和的心态。他的诗集中几乎没有感时伤世之作而多赋物和咏古之作,闲适而从容;孔子六十八代嫡女孙孔丽贞出嫁不久即守寡,其诗中充满忧伤和孤独,但依然不失优雅。他们的创作往往是莞尔的笑容、淡淡的愁怨,含蓄而不奔放,克制而不张扬。

由于孔氏后裔的特殊身份,他们的文学活动带有孔子思想的鲜明印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统的历史意识,道德人格的坚守,温柔敦厚的风范,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孔府文学的鲜明特色。

(责任编辑:依仁)

^① 邹振岳《韵香阁诗草·序》,见《韵香阁诗草》,清光绪十二年刻本。